



比较语境中的场域理论：媒介研究的新范式

时间：2003-12-7 23:38:20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罗德尼·本森 阅读1202次

内容提要 本文介绍了法国已故重要的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并以此为框架，通过分析若干场域个案，检视了比较语境中的“媒介场域”，并深刻剖析了法国新闻界的历史发展和现状。作为独树一帜的理论取向，“场域理论”已经成为当前媒介批判研究的新范式。作者在强调场域理论贡献的同时，也明确指出这个范式尚需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

通过《差异》(La Distinction)一书的英译本，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文化客体的接受与化为己用(appropriation)的研究取向已广为人知。但说英语的学者仍然应该从布尔迪厄关于文化生产，尤其是与新闻媒介相关的著作中获得完整的收益。[1]布尔迪厄和他的合作者Alain Accardo, Patrick Champagne, R6mi Lenoir, Dominique Marchetti, 及Louis Pinto发展了一种以“媒介场域”(mediafield)[2]概念为中心的新闻社会学研究新范式。其中心论点是面对经济场域已然增长的影响和渗透性，新闻的自主(autonomous)性减弱了。新闻媒介，作为统治权力的代言人(agent)，正在削弱其他文化生产领域的自主性(autonomy)，因此也损害了科学知识生产和艺术创新的最佳社会条件。

致力于该知识性课题的布尔迪厄和他的合作者至少在三个重要的方面对英——美式的新闻媒介研究传统贡献良多。首先，聚焦于中观层面的“场域”为传统上割裂的宏观的新闻媒介“社会”(societal)模式(诸如政治经济、霸权、文化和技术理论)和微观的“组织”(organizational)研究路径架设了理论与实证合而为一的桥梁。其次，相对于不是集中于新闻机构就是集中于受众(但很少同时集中于这两者)的那些研究，他们的场域理论侧重于两者间的联系。此外，它挑战“被动”——“主动”受众这种二分法，坚持生产和接受周期的预设的和谐。再次，场域理论突显变化的过程，包括媒介场域自身是如何变化的，以及一个重组(reconfigured)的媒介场域是如何影响其他主要的社会部门的。最后，与英——美式的严格区分研究与政治间关联(engagement)的趋势相反[3]，布尔迪厄、Champagne等人建议并实施一个将政治和知识分子行动混合在一起的项目，以此为他们所队定的社会顽疾疗伤。

文章开始，我把媒介场域模式放在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资本和习惯(habitus)理论的比较语境中。然后，我通过分析若干场域个案研究(其中大多尚无英译本)阐明媒介场域研究取向。我将以强调场域理论独树一帜的贡献作结，同刊指出其中我认为尚未解决的诸般困难。

理论框架

场域及他律(heteronomy)与自主(autonomy)间的冲突

- 传播学是什么？
- 集权主义传播理论——...
- 文化工业再思考
- 最低限度的和谐——论...
- 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
- 媒介即意识形态——论...
- 媒介是条鱼——关于媒...
- 媒介是条鱼——关于媒...
- 传播学理论译介和研究...

理解媒介场域范式的出发点是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基本的场域理论(champs)。布尔迪厄吸收并修正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将社会看作一系列不同的,由其自身“游戏规则”支配的半自主场域(例如,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生产的场域,等等)。它们提供各自独特的交换与获得的机制,然而其基本对立面和整体结构是相互平行的。这些二元对立是社会整体阶级划分的反射与折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甚至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一方面是统治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而另一方面则是被统治的文化权力。简而言之,社会是围绕处于“经济的”和“文化的”权力之间的基本对立而建构的。后者(译按:指文化的权力)在总体上更为微弱,但诚如韦伯所言,它的影响力大到足以合法化并粉饰经济财富。每个场域在“经济的”和“政治的”两极之间复制更大的社会区隔(societal division),围绕着“他律的”(heteronomous)极(pole,代表经济和政治资本,是场域的外力)与“自主的”极(代表特定的资本,例如,艺术的,或科学的,或其他的文化资本类别)之间的对立而建构。

由此,场域,能够根据在其中被给予重视的特定资本的种类以及它们彼此相对自主,尤其是相对于经济和政治场域的自主来加以区别。没有场域是完全自主的,即便数学和诗歌可能近乎这种理想状态。在科学场域,自主意味着学者能够从事研究,并由圈内人士根据纯粹基于科学理由的标准加以评判。在布尔迪厄的模式中,当一个场域支配所有其他的场域,整个社会由此仅剩唯一一种可接受的“人类成就的定义”时,就存在着完全支配(total domination)[4]。场域之自主当被重视,因为它提供了适合每个场域完全创造性过程的先决条件,并从根本上抵制被等级化的支配体系运用的“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

更大的权力场域中的新闻媒介

理解新闻如何及怎样发挥其作用的第一步是将其与其他场域一一比较,通过将人种学的观察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的社会“制图”(mapping)方式来完成。这种方法打破了通常对于社会的理解,并经由科学的审视的距离建构社会的“客观”图景。然而此处的客观,并不意味着现实的完整图景,如我以下论述,为理解起见,它必须和对场域内角色的特殊主观性之构造的分析相结合。

根据媒介场域研究者利用的方法,我们首先试图将新闻场域定位在其最为直接的环境中,即文化生产的场域[5]——这是一个各色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和科学家进行符号创作的场域。文化生产的场域是权力场域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处于包罗各社会阶级的“统治极”(dominant pole)之中。但是伴随当前经济资本支配文化资本的历史状态,文化生产场域也依次被那些与经济权力最为靠近的场域——经济场域和政治场域所主宰。在文化生产场域之内,这种权力的等级被复制,其中一些场域比另一些场域更靠近“经济极”(economic pole)。

文化生产场域被划分为两个部分:有限生产(rescribed)的场域(为其他生产者进行生产,是该场域中最靠近文化极的部分——文学期刊、前卫艺术与音乐等)和规模生产的场域(为一般受众生产,是该场域中最靠近经济极的部分——大众娱乐等)。[6]新闻场域主要位于规模生产的场域,因此更靠近他律的经济和政治之极。(图1显示了新闻的精确结构定位:从左向右移动,经济资本的比例较之文化资本的比例增加了。从下往上移动,不论是文化资本,还是经济资本,资本总量都提高了)[7]



图一 新闻的结构定位

译按:图中 CE 表示经济资本,CC 表示文化资本,+ 表示增加,-表示减少

场域理论进一步将新闻定位于其直接的结构环境(structural environment),全体场域——政

治、社会科学和新闻——彼此竞争，以期“影响……社会世界(socialworld)的合法视野”[8]。媒介场域的“中介”(mediating)角色——它被授予独特的权力以进入并探察其他场域，然后与公众分享其发现——允许它能动地影响遍布当代社会的权力关系。Champagne将新闻场域在权力的场域中的“暧昧位置”归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新闻就效果而言，是有力的，但这种力量严重地受制于经济和政治场域。”[9]

要概念化权力的场域中其他场域的定位，必须将图1设想成三维(的空间)。这样，当经济资本相对于文化资本的比例增加时，盘旋在文化生产场域之上，但日益靠近权力场域右侧的是大学、专业(法律、医学等)、国家的政府官僚机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场域L10j。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例如，在官僚机构和新闻的相类似的定位(location)中，一个位置(position)包含有相同的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比例，以及相同的资本总量。然而，由于这些位置以它们各自特定的逻辑存在于不同的场域中，它们之间并不是可以互相削减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例如当(场域的)占有者(occupant，个人的或机构的)由于同样的社会轨迹而具有相似的布局(disposition)时，这些相类似的位置会倾向于生产相似的品味、行动和观点。比如，场域理论预测(世界报》(La Monde，译按：法国最具影响力的中左派报纸)的读者倾向于在大学、官僚机构、政治和经济场域中占有相类似的位置。

场域及为区分差异的斗争

除却他律与自主间的区分，新闻的场域(与所有其他的场域)是围绕“新”与“旧”的对立而建构的。媒介场域研究者通过分析场域的新进者(entrants)，为这个模式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动态元素，显示“客观的”结构是如何与个体作用者(agents)“主观的”视角相联系的。客观结构和主观经验不是对“社会世界”的两个互为竞争的解釋，而是现实中相互纠缠的两个方面。任何特殊的作用者的复杂性、能力与特征并不归因于他或她屈服或赦免于场域的效果，而是归因于任何处于或通过一系列场域之内的生命轨迹的特性。换种说法，社会由具体化在体制、机构、规范、等级中的“客观历史”和“与习惯相结合的历史”所组成。后者是“根据内化在一系列不同的社会化过程中的模式(译按：所形成的)个人对理解、感知、思考、行动的偏好”。”因此，新闻生产的社会科学研究，即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新闻并以这样的方式来撰写，是一个详述(detailing)“偏好”(习惯)和“位置”(场域中的结构性定位)的一个过程。

对场域理论而言，场域中定量和定性方面的人口特征变化都是至关重要的。场域中新的作用者的快速流入既可能成为推动变革的力量，也可能成为保守势力。在管理和机构层面，新进的作用者只有显示他们的与众不同才能确立他们自己在场域中的地位，因此也就成为他们创建新的媒介或采用独特的编辑基调的最大的激励因素。然而，新进者的数量相对于空缺的职位也同样重要，尤其在入门阶段。工作竞争压力的增大，使得记者日益小心翼翼和循规蹈矩，导致这个场域的简单复制。[12]但重要的是指出，这些形态学上的变化主要由每个场域的内在逻辑居中调停，因此同样的人口统计上的刺激因素可能在不同的场域范围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

MainAcardo强调，有必要检视是谁进入场域——他们的社会/经济出身怎样，他们在何处求学和接受职业训练，以及他们如何在工作中得到升迁?新进者阶级成分的变化能够成为场域内活力的源泉，尽管更可能是通过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迁移。[13]高等教育和职业训练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提升了场域的自主性，抑或增强了他律的力量，是一个经验性的(empirical)的问题。新闻学院的发展帮助了专业的新闻工作标准的巩固和扩散。[14]与此同时，这些院校沿袭着狭窄的技能培训，这种与批判性的知识分子的训练相割裂的“美国模式”已经使得记者们更不太可能对社会现状提出质疑。[15]而法国的精英记者中，曾经就读于门槛很高的、专门培养未来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的巴黎政治学院的人数的增加，也足以让人相信这将进一步削弱未来的新闻记者对支配性政治观点采取批判立场的自觉倾向。类似的变化，当然也能够其他国家的语境中得到检视。

总之，进入新闻场域要求接受其基本的游戏规则，而这种规则本身是一股强大的惰性。因此，

即便“旧一新”对立具有改变他律—自主间力量平衡的潜力，但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它才能最终改变更大的阶级关系的社会结构。然而要理解这些条件如何产生，具有何等效力，我们必须首先更深入地探讨新闻场域的内在驱动力。

法国的新闻场域

(相对的)规模生产和(相对的)有限生产之间的差异(distinction)在新闻场域(电视之于印刷媒介)内，在每个媒介(私营的法国电视一台TFI之于公共电视台Arte[16])内，以及每家媒介企业(头版政治新闻之于其他版面的醒目标题)[17]内都得到了复制。因此，很难对新闻事业“简而言之”(toutcourt)。因为事实上，基于媒介单位、新闻条线(都市、文化、商业等等)或者记者个人接受“自主极”或“他律极”的程度，新闻场域内部又有诸般显著的不同。能够并的确变化的是两极的相对“吸引力”。布尔迪厄使用爱因斯坦的物理学作喻：“物体越具有能量，就越能使其周围的空间变形。一个在场域中非常强大的作用物(agent)，能够使整个空间变形，迫使其他空间围绕其而进行组织。”[18]具体地说，媒介权力根本上是双重分析——他律和自主权力的变化关系，以及新闻场域中新进者变化的人口统计特征——产生了以下对战后法国新闻场域变迁的历史叙述：20世纪70年代以前，(法国)的新闻场域被严格地区分为“严肃”新闻和“流行”新闻，前者为精英受众生产，后者则面向普罗大众。19世纪中后期，廉价的追求感官刺激的报纸兴起，尽管它们是非全国性的，可信度也不高，但覆盖率仍然很广。这并不是说发行量对报纸的影响力而言是次要的。报刊要对政治场域发挥有力的作用，除了高质量的专业表现外，也需要有较高的发行量。由此，精英、严肃报纸维持了不可挑战的权力——对大众、党派和另类报纸上出现的新闻报道加以合法化(leptimize)(或相反)的权力。二战后，《费加罗报》(Le Figaro译按：法国发行量最大的中右翼日报)及此后的《世界报》，在法国支配了这种权力。因之对大众报纸泛滥的根本否定，商业的但严肃的报刊将新闻场域整体向“知识分子极”拉近，而全然不顾新闻业从那时起至今是依靠读者和广告主而生存的一个事实。在此权力架构下，“好的新闻记者”的支配性定义是那些重视事实准确，能够赢得同行尊敬，拒绝抢新闻和耸人听闻报道的记者。[20]

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的电视和广播，尽管拥有大量受众，仍无法对严肃报纸杰出的“造神”权力构成挑战。被法国人称为声像媒介的广播电视由国家控制，因此事实上在公众和其他新闻从业者眼中，它们更像是权力场域而非新闻场域的一部分。1968年以前，法国的电视节目中没有广告。70年代电视广告获得稳步增长。1982密特朗开放了声像媒介的商业化，直至1987年TF1(法国电视一台)的私有化戏剧性地改变了新闻场域的力量均势。私有化在增加了电视保持受众市场高占有率的商业压力的同时，也提高了电视新闻在公众中的可信度。相对更高的可信度和更多的受众，电视能够达成大众报纸做不到的成就：将强大而“合法”的商业压力引入新闻场域的中心，从而将整个媒介场域从“知识分子极”拉向“商业极”。

和严肃的印刷媒介不同，电视的力量“不是基于其新闻生产的内在质量”，而是存在于其广泛的、近乎无远弗界的扩散性，它赋予电视无与伦比的影响舆论的能力，并得到政治人物的高度重视。在新的商业电视主宰的媒介权力架构中，“好的新闻记者”是指能吸引最大多数受众的人。[21]这并不是说严肃报纸不再发挥其影响力，也不是说它所坚持的知识分子标准的消失。而仅仅是说，电视已经成为有竞争力的、终极主宰的、“造神”的力量。一个明显的事实可以证明电视重要性的增强：印刷媒介上专门刊登电视节目的版面数量的增多(甚至是《世界报》)；电视记者在新闻场域内得到的更多的尊重(例如，一位法国电视新闻播音员后来被任命为一份主要新闻杂志的编辑)；经由电视报道的新闻，即使它一开始为印刷媒介所忽视，仅仅因为它出现在电视上，而因此成为必须被印刷媒介报道的“事件”[22]。而且，商业电视不再总是向严肃的印刷媒介的新闻价值俯首称臣。

总之，电视已经修正了媒介场域内的“信息流动”，也就是哪些新闻和哪类新闻被选择并成为“媒介事件”，以及哪些报道只能刊登在内版或小报上。此外，因为电视提供了一种以收视率来测量的“好新闻”的竞争性定义，所以它已然打破了新闻业的“严肃”与“流行”的旧的二

分法，削弱了指导记者行为的传统的知识分子标准。我以下会详细谈到，可能电视最深远的效果，还在于电视主宰的新闻场域已经将其商业逻辑强加于其他文化生产的场域，例如司法、哲学和医学研究，以及政治场域。因为不同的场域是相互紧密纠缠的，因为新闻是不同场域间独特的至关重要的中介，当新闻场域变得更商业化，因而与经济场域更趋类似(更加重叠)时，它增强了各场域内他律极的力量，在所有场域间产生一种聚敛并将它们拉近位于更大的权力场域中的商业极。(图2，当新闻业更紧密地和经济场域排列在一起时，它的资本总量[纵轴]增加，它的经济资本相对于文化资本的比例也增加了(水平轴)。因此，从70年代到90年代，新闻业在场域中向右上方移动，并带动其他场域一同移动。图2也显示了政治和大学场域总资本量相对衰减)[23]



图二 法国的权力场域

译按：图中 CE 表示经济资本，CC 表示文化资本，+ 表示增加，-表示减少

新闻业对于社会的影响：三个“场域个案研究”

哲学和科学界

对相对自主的科学和文化场域而言，当代新闻业就像“特洛伊木马”——小心翼翼的进入场域的城池——只是为了向那些接近他律极以寻求颠覆现存等级秩序的内部作用者提供必须的支持[24]。这类入侵部分地归因于新闻的纯粹的知识分子面向——一种带有分解专门的学术领地并褒扬那些最接近新闻自身不成熟的折衷主义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兴趣的、泛化的知性主义(intellectualism)。是电视给予新闻业更广泛的影响范围和导致与其互动的场域发生变形的能量。然而，这些场域变形的源泉并非媒介，而是来自广泛的人口变化和社会变迁——根植于战后法国高校体系的扩展和一支由失业的文化工作者组成的“后备役”的出现。[25]这已为许多特定场域内不能通过同辈的推崇(consecration)而得到发展的年轻作用者创造了使用大众传媒作为“与正统卫道士进行内部斗争的武器”的动因。[26]

Louis Pinto认为哲学场域已经成为最显而易见的战场，大众传媒在此被用来重新定义法国知识分子力量的意义与范畴。二战以降，尤其是60年代以来，哲学已眼见自己从支配性的知识地位沦为仅被名声日隆、日显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利用的社会科学学科。但同时法国，哲学仍保有一定的向权力说真话的道德权威。在任何场域中，一个人对场域内部普遍的文化资本价值受到的外部威胁的反应，取决于其在场域中的地位。那些最靠近自主极，备受同辈推崇的人通过“他们的知识存在赖以继的、学者的(处事)原则的猛烈而孤注一掷的永存不朽”[27]回应了哲学的危机。相反，那些最靠近他律极的人——通常是年轻的或受雇于学术界的边缘的——对创造新的哲学家的定义和哲学的新闻目标颇感兴趣。同时，不断扩展的大学体系为学术界稀缺的工作机会培养了太多的候选者。它也为哲学写作——尤其是难度中等并和日常的大议题相关的——培养了大批新的受教育公众[28]。《世界报》和《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周刊通过定义、定位和褒扬新一代的“世俗哲学家”，如Bernard-Henry Lévy, Main Finkielkraut和Andre Glucksmann，在改变哲学场域内的权力均势的过程中，帮助解决了这个危机。这些严肃报纸对世俗哲学家的推崇不仅服务于它们扩大读者面的利益，而且确认了记者自身居中(in-between)的知识分子地位。

对这些媒介哲学家和其他经常在媒体上出现的知识分子，布尔迪厄保留了有影射意味的字眼——“通敌者”(collaborators)。[29]除了易起争议的意图外，这个单词派生于布尔迪厄授意(inspired)的研究。该研究显示在维希政权时期，那些拥有他们特定场域最多资本的文化生产者最倾向于抵抗当局，而那些最依靠他律资本的人则最倾向于通敌叛变。[30]从一定的视角看，场域理论者对媒介知识分子的敌意正是他们分析的现象的一个部分，这就是，新闻权力的

稳步增长超过了社会学家的和其他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的权利。布尔迪厄回忆，在过去，像Raymond Aron这样的知识分子直接参与媒介场域，并不从中获取报酬，但Aron作为合法的学者的可信度，起码在法国国内，受到了损害。像萨特和福柯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时不时为报纸或政治杂志写作，但(他们)有足够的力量确定这种关系的界限。在这些遭遇中，新闻记者扮演了对这些知识分子大师毕恭毕敬的小学生(的角色)。[31]一定程度上，这种情形现在已经反过来了。新闻记者将他们自己视为是和知识分子平等的，如果不是更高其一等的话。布尔迪厄发现，当他参加电视新闻杂志节目“视像凝聚处”(Arret sur images)时，电并帮助(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现状进行再生产。[33]真正的哲学或科学的回应是需要时间去酝酿和准确理解的，因为这些思想常常与我们的常识相冲突。因此电视消减了公众辩论，并对真正对立的思想间勾连(articulation)实施审查。

在知识分子名人使用媒介回避科学场域的方法和蛊惑人心的政客(像国民阵线的勒庞)将媒体用来在正常的政治进程中进行最后一搏的方法之间，场域理论设定了一条平行线。恰如商业腐蚀并最终摧毁科学一样，煽动性的政治蛊惑和情感诉求对理性政治来说是毁灭性的。[34]

然而，除却那些不会遵循媒介规则的知识分子(或政治人物)，威胁并不仅存于媒介场域之内。当媒介曝光和公众口碑成为法国大学的“雇佣和终身教职委员会”的一种考量时，“智力的收视率调查”(mentaliteaudimat)就进入了学术的围墙。媒介的“造神”日益被同行们看作与专业“认同”同等重要。布尔迪厄和他的同事认为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允许不够格的人进入学术专业界，损害了严格的科学标准的执行。司法

传统上，相比哲学界，法国司法界与媒介保持着更远的距离。还是在1992年，《世界报》出版了一本书《法官在说话》(LesJugesparlent)。R6mikenoir问到：这些在说话的法官到底是谁?这些在说话的法官是“记者所谈论的法官”，[35]而远非所有法官中具有代表性的随机样本，或者最受其同僚尊敬的那些法官。

给先前沉默的司法界以发言权始自20世纪60年代，当时新的国立法官学院(Ecolenationale de la magistrature)培养出的过量的年轻法理学家与那些想保持他们特权地位的年老的等级秩序的掌权者产生了冲突。由于新的专业储备，这个年轻一代也有着与老一辈不同的专业价值(不同的“好的法学家”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早期，新生代法学家，尤其是那些左翼的法官工会(Syndicat de laMagistrature)成员开始与左派报刊如《世界报》、《解放报》(Libdration)和《新观察家》周刊中同情他们的年轻记者建立联系。这些记者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力也随着社会党选举获胜的希望增大而得到提高。

通过媒介，法官中的活跃分子能够规避司法场域内通常的责难，而直接向场域外的政治代表表达意见。今天，许多以前的工会领导人在其职业中拥有近乎至高无上的地位。已经发生变化的是职业底层职位的功能和声望，特别是“地方预审法官”(juged' instruction)。作为年轻的法官活动分子和记者的稳定的媒介联盟，这个以前的低级职务已经在推动整个司法场域向他律极靠拢的过程中，提高了自身的相对声望与权力，因此提升了媒介逻辑在司法场域内的影响力。Lenoir认为媒介影响力在司法场域中产生了暧昧的结果。经常对媒介提出批判的场域理论，首先是一种冷静分析场域驱动力和效果的工具。

医学研究

在第三个场域个案研究中，Champagne和Marchetti显示了新闻场域的变化和它与医学场域的关系是如何制造并扩大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关于法国年轻的血友病患者感染艾滋病毒的公众丑闻的。[36]类似美国式的对“社会问题”[37]的质疑，两位作者的基本论点是，媒介对这个问题加以强调的方面并没有那么严重，它们把在科学界尚处于广泛争议的几个方面当作了事实本身。

在另一个媒介场域分析中，Champagne和Marchetti从一般到特殊，检视了社会“外在的”和新

闻“内部的”两个驱动力。80年代，医学场域由于不断上升的医疗成本变得更商业化，也由于需要确定它自己在公众医疗支出中的份额而变得更政治化。医生数量的增加加剧了场域内的竞争，又造成进一步的商业化。“病人”变成了“客户”。这些变化，加之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越来越老于世故的公众把医生赶下神坛，并要求医生担负起更多的责任。

在新闻场域内，发生着一系列不同的变化。最基本的，如前所述，印刷媒介正渐渐失去对商业性的电视媒体的优势。具体地说，这意味着利用(tap)大多数观众的对戏剧性的、煽情的和个人化影像的瞬间偏好的“Audimat’”逻辑(法国类似于尼尔森的收视率调查)，代替了侧重政府不同机构政策议程的“机构”(institutional)新闻的逻辑。[38]在印刷媒介场域内，《世界报》已经失去了其近乎垄断的“造神”权力。而其他严肃的但不呆板的日报，如《解放报》(1981年已经采用了新的商业模式，脱离了如萨特、西蒙·德·波娃尔等创刊人的活跃分子最初的控制)和周刊，如《周四事件》(LEvenement duJeudi)设定了更为引人注目而大胆的报道基调。

最后，在医学报道的小场域内，另一系列变化为血液污染的公众危机搭建了舞台。1980年以前，《世界报》，尤其是它的一位由医生转行过来的记者控制了(法国的)医学报道。1985年这位记者的退休，加之长期酝酿的内外部变化——医生数量的供大于求使《世界报》的竞争者拥有了自己的医学记者，《世界报》对媒介场域整体支配力的衰落，更加激烈的对读者和广告主的竞争氛围，以及在医学研究者之间为媒介接触而不断提高的“媒介精明”(medi—savviness)——产生了一个新的医学信息的经济体系。

在“专门化”的医学新闻部门内部加剧的竞争和分割损害了专家们(specialists)用他们的专业意见反对报纸和电视中的“杂家”(generalists)的能力。后者并不把血液污染事件看作是一个复杂的科学决策，而是夺取充满道义控诉的、群情激愤的受众的一个把手。在这场针对等级化的支配原则必然发生的斗争中，一般记者(generalists)渐渐接管了对丑闻的报道，也就是，继续把这个事件建构为一个丑闻。他们试图重新定义专业记者和一般记者的区别：前者只是简单地对信息进行重写，而后者认为信息的价值必须被“挖掘”(soughtout)。然而Champagne和Marchetti认为，这个自私的区分隐藏了另一个(事实，即)有两种信息：人们能够理解的和不能理解的。一般记者对事件最基本的科学层面的漠视使他们不能在问题相互竞争的定义中作出公平的判断，而代之以一种平衡的概念(根植于政治报道，但对科学并不适合)：报道每一个戏剧性的或煽情的证词，不管(它们)在科学上多么令人生疑。一般记者也会夸大和嘲弄每一个暂时的假设(比如测试蚊子和HIV感染之间的联系)，破坏了研究者进行尽可能多的科学调查的能力。理论上，Champagne和Marchetti显示了媒介场域中不断增长的他律极的力量，加强了医学界的他律极，破坏了根据纯粹的科学原则进行的医学研究实践。

反击媒介权力

媒介场域研究者没有仅仅简单地对新闻媒介提出严厉的诊断，然后将其丢在一边，不加理睬。他们辩称，改变的第一步是要意识到无形的信仰结构和导致(其中的)角色不自觉地复制这种体制的实践，即使他们是在抗争。例如，了解发掘独家新闻的有害效果的记者可能采用新的更有意义的方式去关注公众议题。新闻分析显示，不能仅仅把相对边缘化和失去公民权的人补充在他们的“嘉宾”名单中，更应提供一种积极的行动，主动使非媒介的专业人士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明确表达(articulate)他们相反的，因而不能很快得到概述的观点。

布尔迪厄和他的同事坚持认为在“合适的条件”下，学者们有责任使公众获得他们的研究成果。进入社会科学界的标准应该提高并严格地得到遵循，研究者应该经常地和他们场域外的受众进行交谈。那么，被同行推崇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掌握他们自己的意见的扩散，而不是在关心收视率(Audimat-minded)的记者和他们的“好的客户”(bonclient)——知识分子之间交换事先商定的观点。与其将某个信息分解为更低层次上的公分母，不如在教育上努力以提升受众的理解水平。布尔迪厄毫不犹豫地给予这个研究目标以溢美之词：

人们必须维护为获得“普遍”(universal)进步所必须的生产条件,同时,必须使进入“普遍”的条件普遍化(generalize),为越来越多的人达到这个适合“普遍”的必要条件而负起责任。[39]

这个反后现代主义者的信条代表了布尔迪厄对民主的理解中科学和理性成分的增加。这个信条不是瞬间的消费选择,而是“公众理性的开明而理智的集体观点的表达”。[40]

通过运用科学理性与媒介符号暴力进行的斗争(由此改变了媒介场域的功能),媒介场域研究者已经寻求直接“干预”由媒介支配的公众辩论。一本厚厚的研究报告纲要《人世苦难》(La misere du monde),关于贫困和其他形式的“社会痛苦”的直接证明,畅销法国,并有助于被主要政党和主流新闻媒介忽视的议题得到更多的关注。[41]由布尔迪厄的独立的出版社Liber-Raison d'Agir出版的《关于电视》(SurJotelevision)有意识地保持文字的简明,以吸引尽可能多的潜在读者。这本畅销的“红宝书”(Uttleredbook)引爆了来自记者和知识分子的批判。此后,Liber-Raisond'Agir出版了《世界报》外交记者Serge Halimi曝光法国新闻媒介内幕的著作。像《关于电视》一样,Halimi的“黄宝书”也已经成为法国的畅销书。[42]

比较语境中的场域理论

为考察媒介场域范式的不同,我现在把其在主要概念上和方法论上的特点与目前媒介研究的主导模式(文化的、技术的、政治经济的、霸权的和组织的)进行比较(参见表1):[43]

类型	对新闻媒介行为主要影响	媒介信息的生产与接受关系	是否侧重于媒介和社会变化?	媒介的社会效果
文化	民族文化,符号系统	被动的受众:强大的媒介传递民族文化	否。侧重再生产	反映/加强民族文化
技术	技术种类(电视与报纸等)	被动的受众:技术变革意识	是。但仅跟随技术的戏剧性变化而变化	改变意识与社会关系
政治经济	资本控制	被动的受众:资本主义的媒介传递亲资本主义的信	否。侧重再生产。	资本再生产
霸权	经济—政治体制	被动的受众(但保持“抵抗”和“重新编码”的能力)	是。侧重再生产。	霸权再生产
场域理论	调停外部经济和政治影响的半自主新闻场域;惟一聚焦于“中观”层面的具体的新闻利益	抛弃被动—主动二分法;媒介生产者 and 受众同质相连,产生“布道”效应	是。媒介场域和经济、人口和技术变化互动,与可能产生变化的其他场域发生联系	改变(或再生产)社会等级;破坏科学知识生产的最佳社会条件;破坏政治场域中的民主“理性”
组织	机构限制	不关注受众	不关注变化	限制或扭曲提供给公众的信息范围

表1 场域理论与其他研究模式

新闻场域:对“中观”层面的制图(mapping)

首先,如上所述,“场域分析”提供了一种连结宏观—社会与微观—组织分析路径的分析框架,将新闻场域放置在与更大的权力场域的关联中,解释外部力量是如何转化(trans—late)

到新闻场域半自主的逻辑中的，场域理论将自己与“粗糙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取向划清界限。后者试图借助单一的所有制形式和控制来解释新闻媒介的行为。[44]同样地，布尔迪厄和他的同事已经大胆地对某些理论家提出了反对——如Régis Debray，他过于强调新技术的影响力。[45]

尽管文化取向通常和其他模式相匹配，但从分析的角度说，它与其他(研究)取向截然不同。一定程度上，文化取向强调符号系统的上层约束而忽视更世俗的权力斗争。场域理论的“结构的构成主义”(Structural constmctivism)与以罗兰·巴特和福柯为代表的文化符号取向泾渭分明，而福柯在联结话语分析和社会结构方面并未获得成功。不过布尔迪厄对Jean Baudrillard和Guy Debord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保留了最严厉的批评。他认为后者的“观览的社会”(society of the spectacle)是一种“虚假的愤世嫉俗的激进主义”，用来压制任何真正的媒介批评。[46]Dominique Wolton和Jean-Louis Missika提出一个更加实证取向的法国文化研究路径，把电视描绘为“民主社会最民主的工具”。[47]然而，从场域理论的视角出发，Wolton和Missika的实证取向和对新闻的社会角色过分宽容的评价显露了他们对研究对象缺乏科学和政治上的独立性。[48]

作为另一个处于最微观层面的取向，组织理论倾向于仅仅聚焦在单个媒介组织或媒介的部门。组织研究强调雇主和作为主要资源的官方机构对记者施加的官僚制约。[49]场域理论和组织取向一样，是高度实证的研究取向，兴趣在于新闻业每天的实践。但是，与大多数组织研究不同，场域理论不仅小心地将特定的媒介组织和他们所处的直接的制度相联系，也仔细地在它们和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之间建构关联。

场域理论与以历史和机构为基础的文化及霸权模式的关系更为复杂。媒介场域模式承认这种位于社会中间层面的考量和美国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的至少是其中的某些流派(strains)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场域理论可以被比为“新制度”理论，后者也用半自主的“制度逻辑”或“社会问题竞技场”来对社会进行概念化。[51]但是和场域理论家不同，新制度主义论者大体上倾向于忽视经济权力和权力议题。他们还没有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新闻媒介。一些新制度主义论者呼吁一种“政治和制度取向的综合”。[52]，场域理论在此方向上迈出了充满希望的一步。

大体上，媒介场域模式将自己定位在两种研究取向之间：一种是犯了“短路”错误而将文化生产直接和广泛的社会阶级或民族社会相连；另一种是过于狭窄地关注文化生产者，而不承认文化生产和其环境之间的结构性关系。[53]通过引入新闻“场域”而调整了社会范畴(sphere)，在“结构化”(structtttralizng)韦伯的同时，场域理论“韦伯化”(Weberizes)了媒介研究。在此社会范畴中，社会层面的冲突并没有被简单地复制，而是根据场域特定的逻辑和新闻专业工作者特定的兴趣被反射。结果，场域理论比其他的取向更多地把重点放在这样一些现象上：独家报道的竞争，《报刊评论》(revue de presse)(记者从中监控他们在其他媒介单位的同事报道的新闻)，为接近新闻源的争夺，各种新闻机构相对的声望的变化，等等。

媒介场域模式的相关的、空间的思考方式(mode)和历史化的实证取向对更大的跨国媒介体制研究或有助益。[54]特别是，比较研究能够采纳场域概念涉及其他主要社会场域的国家的媒介场域进行详细的结构制图(mapping)。这样研究者就能探索并显示国家的权力场域和内在逻辑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媒介场域内的权力关系的模式(pattern)。

不过，当研究者试图去使用场域概念进行比较研究时，其中的一个问题可能就变得更明显了。主要困难来自经济和政治之间利益(也就是“政治和经济权力之极”[55])的经常省略。这个结构暗示市场和政府前后(相连)，但从粗糙的马克思主义出发的场域理论否认这样直接的联系。问题的一部分在于考察布尔迪厄派的模式中的“国家”(state)时，就法国的情形而言，它至少在三个方面被操作性地加以定义。首先，通过基本的教育功能，“国家”充斥在当代西方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像所有其他的社会角色一样，新闻记者在世界观和习性方面一定的基本特征

得自早年国家教育的社会化，他们的职业习惯（如我们注意到的那样）受到国家赞助或认可的高等教育的影响。[56]第二，在很大程度上，国家能够被看作与权力的场域同义，或者是通过社会中的景象(vision)和分界(divisonn)之合法性原则的自我斗争。[57]在这点上，如Gramsci(所言)，新闻媒介并不位于国家之外，而是处在国家内部的。

但是，场域理论中第三个更局限的方法是依照“政治”和“更高层的行政事务”的特定场域或官僚场域的整体来概念化国家。[58]根据社会经济/文化连续体的类聚(grouped)，这些特定的国家场域比大学或文学场域更靠近经济极，依此理解，它们能够在一个由两种基本权力类型构成的模式内合为一体。然而，像所有其他的场域一样，政治和官僚场域将它们自己特定的利益囊括其间，并为获取霸权而参与到更大的权力场域中。在此，二元结构主义的逻辑似乎是站不住脚的。如果，由定义来看，场域无法被化约为外部利益，而总有其自身的特他律权力。Champagne坚持认为，在当代西方社会“政治权力以间接的经济权力的方式向媒介施压”。[59]然而，这个强烈的主张将形形色色的方式弃之不顾，有时这些方式与市场的最优化运作相左。政府官僚在市场中对新闻媒介发挥作用，例如统治官方消息来源和记者之间关系的诽谤和信息公开的法律及规范。[则此外，媒介场域研究者承认场域冲突的复杂性，但是没有提出他们的二元模式中的矛盾牵连。

在场域理论和霸权模式之间存在着一个能获得最大收益的直接对话：人们可以保留场域理论的重心：新闻生产首先是新闻场域内自身竞争的结果，或者简单地说，新闻记者有不能化约为外部利益的本身的利益。但是这些外部利益自身必须被想象为也是无法化约的、复合的和潜在矛盾的。这个概念的调整或许也要求模式的图形再现发生变化：可能是一个立方体或六边型，而非正方形。

尤其对美国人来讲，布尔迪厄、champagne等人的实际的场域分析提出了重要的实证研究问题。如果不是非常难以研究的话，对于几乎自建国以来就拥有商业支配的广播电视系统的美国，商业化影响的问题似乎更是如此。法国的相对迟到的广播和电视私有化经验，不仅提供了与美国进行比较研究的机会，而且大体上已经揭开了被长期排除在外的商业化问题。[61]出于同样原因，美国人也很难评估他们的公众生活中所缺乏的强大的知识分子场域的影响：至少从让·保罗·萨特1980年去世以来，法国知识分子和学术界的衰落及媒介知识分子和记者的成长提供了另一个个案研究：阐释当记者大量地替代了公众辩论中的知识分子时，什么(因此)失去了？

场域的理念也允许人们开始从结构—关系的视角考虑全球媒介机构和实务的聚敛(convergences)：布尔迪厄注意到，为完成场域分析，“人们必须考虑国家的媒介场域在世界场域中的位置，例如，美国电视在经济、技术，特别是符号(译按：内容)上的支配，成为许多(法国)记者的想法、规范和程式的模型和一个源泉。”[62]因此，法国和美国新闻界的异同可能不仅仅与他们迥异的民族传统有关，而且还与它们所处的世界媒介体系中的等级—结构的关系相联系。媒介接受：补充而非“抗拒”生产

场域理论挑战媒介研究支配性范式的第二个方面是新闻生产和接受之间的关系。媒介研究者不是倾向于研究产生媒介讯息的“客观”过程，就是倾向于研究受众诠释(讯息)的“主观”过程，但不是同时研究两者。由此产生了争论：相对于政治经济的和程度稍逊于其的霸权和文化模式同时发生时的受众的消极，在何种程度上，受众诠释媒介讯息时是“积极”的。作为回应，许多受众研究针对用不同方式解释媒介讯息的受众的事实，但这些研究者夸大了他们的个案，他们的结论称诠释本身构成抗拒。类似麦克卢汉的技术取向，过分倾向于技术决定论。[63]而更多的新闻组织研究则忽视了受众的议题。[64]

布尔迪厄和他的同事认为，对特定的文化产品而言，在生产者和受众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同缘关系(homology)。即便没有有意识的按需供应的企图(尽管也可能是企图“未遂”)，新同缘关系。[66]

因果关系循环往复并相互增援 (reinforcing)。一方面, 供应方“总是施加符号的强迫接受 (imposition) 效果”。报纸是通过“专业工作(我们可以用‘诠释’或‘见解’来代替品味)从半形成或未形成的经验的模糊不清的‘半存在’ (semi-existence) 上产生的一种组合品位 (constituted taste)” 。另一方面, “每一个由于存在条件改变及相应的布局改变引起的品味变化很可能将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生产场域的变化。(这是)通过在生产场域内鼓励最能够根据新的布局按需生产的生产者的斗争的成功(而形成的)生产场域的转化。” Io, 在能够使用“抗拒”这个术语的程度上, 它是一种内部游戏, 产生自前卫记者中的小规模生产场域和统治阶级中的相应分层 (fragments), 他们在自己为差别 (distinction) 进行的抗争中认购了这些新的产品。

商业电视的兴起如何改变了这种平衡? 作为无所不包或大规模的商业媒介, 电视“通过调整自己以适应预存的需求, 从而确保了成功和相应的利润。” L6J 因此, 不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同时引导读者及表达统治阶级中 (不同) 阶层品位的小规模生产的媒介, 商业电视在强化社会舆论一律 (consensus) 的层面上发挥作用。[69] 有线电视带动了新的频道和节目的繁殖, 就像美国那样, (法国的) 电视可能开始更像一个阶级区分 (differentiation) 的作用者 (agent) 而进行运作。

对场域理论来说, 电视与受众关系的另一个关键方面, (与印刷媒介对立的) 是它目前的测量几乎每一分钟观众注意力 (的一种已被建构的形式) 的能力。由于这种加剧了的受众压力, 或者说更由于对受众测量的合理 (性) 的感知, 电视偏爱政治行为中戏剧性的、情感强烈的和场面热闹的形式, 以及 / 或者削减政治新闻的总量, 而代之以非政治类新闻。然而, 这不仅仅是满足“大众” (111aBS) 所需的一个简单过程。大众本身是建构过程的一个结果。Champagne 分析到, “Audimat” 收视率调查仪怎样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舆论——半成型的情绪的瞬间聚合, 削弱了所有其他的民意表达方式的价值——例如公众示威和工会、反种族主义者或环保组织等代表机构——由此减少了社会“相对自主的反映和行动的容限” (margin)。[70]

与生产一接受密切相关的疑问已经变成关于意义诠释的问题。例如, Wendy Griswold 对照了“意义诠释”取向和忽略意义的议题并将“文化现象”简化为“社会机构单一意义 (univocal) 指标”的“制度”取向的不同, 布尔迪厄被包括在后者。[71] 确切地说, 布尔迪厄和他的助手们试图在“诠释”和“制度”间架构联系。场域理论关心意义是如何通过符号间不同的作用和产生符号的社会动因 (agents) 之间不同的作用而相关生产的。当然, 源于媒体或其他方面的所有讯息, 都是潜在的“意义多元的” (multi-vocal)。但如同媒介场域模式强调的, 在实践中, 讯息由特定的生产者生产, 在这里, 意义, 不管是否复杂, 即便不总是被完全同意, 但也是能被理解的。

各种批判也已指出, 布尔迪厄“基于阶级” (class-based) 的文化生产和消费系统可能只是文化产品流通的一种方式。根据场域理论, 产生自新闻场域的文化生产与需求既是同源批判: 在继续强调生产和需求间关系的系统特性的同时, 显示权力的多种类型是如何既复杂化了生产和需求之间的关系, 又有助于理解跨越时间和社会的变动的。

布尔迪厄学派的研究取向中仍具有无可争议的价值的是它要求更多地按照“相互调整” (mutual adjustment) 而非“劝服 (persuasion) 与抗拒 (resistance)” 来思考任何新闻单位和其受众间的关系。顺此思路, 针对意义 (meaning) 的斗争的真正位置并不在任意特定的文化生产者和他们的受众间的关系上, 而在于为生产有关“社会世界”的合法知识的权力而进行相互竞争的文化生产场域 (生产者与同质受众) 之中。新闻媒介和历史变迁

场域理论的第三个主要贡献是它强调媒介变化之议题: 媒介场域内部的变化如何产生及媒介场域自身如何能产生社会变化。既然布尔迪厄作为一个再生产理论家而常常被置之不理, 这个贡献就多少有点讽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中, 社会变化大体上被弱化, 而媒介的角色多被强化——霸权研究倾向于保留政经模式中的马克思功能主义, 或者至少是一个关于再生产或

有限变化的强调重点。[73]组织理论通常不针对有关变化的议题，部分原因在于它们出身于人种学的个案研究。[74]尽管技术理论确实提供了有关变化的理论，但它们通常侧重于长时期的变化，新技术被孤立于它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语境。[75]

在场域理论中，场域结构中的变化有两个基本来源。由于在场域中的存在是为了“求异”(todiffer)，[76]因此当新的角色试图进入场域并在其中发挥作用时，“区别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distinction)[77]保证了变化的持续产生。(场域的)向上，尤其是向下的迁移——所谓“异常的轨迹”(deviant trajectories)是在偏好(习性)与地位之间产生“误配”(mismatch)的另一个主要缘由，它可能威胁并动摇场域。[78]最后，由其内在动力驱动的，诸如大学或政治等紧密相关的场域中的变化，能够对新闻场域产生重要的交叉(cross-over)效果，反之亦然。[78]这些关于“内部”和“内在”场域驱动力的假说，或能为英一美学者提供新的重要的研究指向。

然而，根据场域理论，形态学上的变化不会有主要的影响，除非场域的新进者获得第二类转变的支持：如“政治突变”(breaks)，或技术、经济和人口学上的变化等外部因素。[80]布尔迪厄的确强调在当代历史语境中经济场域的强有力的决定性影响。但是他告诫：“即便在它们最普遍的进化趋势中，(不同)场域间的关系……不是一劳永逸地被确定了的。”[81]Pinto在关注驱动哲学场域变化的“相关独立的因素的复杂整体”时，强调最典型的媒介场域研究的“多因果关系论据”(multicausalityargument)。[82]即使不考虑布尔迪厄作为大理论家的声望，他的场域、习惯、和资本的概念也如预期，成为相对宽泛的实证研究的灵活工具。因此，矛盾(ambivalence)和缺少结论是有几分有意识的。[83]

方法论上，场域理论引入与众不同的“场域个案研究”取向，在此媒介场域与另一场域的关系得到了跨越年代的系统检视。这个取向通常和场域的“社会(史前)历史”结合在一起，作为一种“割裂(rupture)的工具”，帮助分析者了解他们早已居住其间并习以为常的研究中，媒介企业或媒体的“权重”——它影响场域内其他作用者的力量——是被“断言”(asserted)的，而不是被“证明”(documented)的。

对布尔迪厄和他的同事来说，他们研究取向的方法论的和理论的要素是和一个政治课题相关联的。说英语的学者似乎很难想象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对他们观念的扩散进行的集体控制。严肃新闻(美国的远比欧洲的“先进”)的迅速衰落，理应促进相关的学术界、作家和艺术家的对主流新闻业进行公开的和联合的批评，以要求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强化电视服务于公众利益的责任，并创造其他逻辑(而非市场的逻辑)能够主宰的新的公众空间。

对政治行动不怎么感兴趣的研究者仍然可从思考场域理论一系列的重要洞察而获益良多：将媒介概念化为一个联系的场域；用新闻场域的特定利益并涉及外部压力来解释新闻媒介的内容；重视新闻的生产和接受如何互为条件；检视媒介自身的制度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响科学和政治知识生产的社会认识论状况。(如何)将法国的场域理论和新制度的及“空间的”(spatial)理论整合起来，发展并进一步提炼这个令兴奋的研究范式，仍将是一个挑战。[85]

(韩 纲译 作者：巴黎美国大学国际传播系主任)

注释

[1] PaulDiMaggio早些时候提到过布尔迪厄与美国“文化机构”(cultural organization)分析者的密切联系，包括他本人，PaulHirsh，以及RichardPeterson。参见PaulDiMaggio：

《评论：关于皮埃尔·布尔迪厄》，{美国社会学学刊} 84 / 6(1979)：1472。近期，ChandraMukeqi和Michaelschudson相信布尔迪厄的《兴趣在于检视文化实体(entity)的“供给”及“需求”》。参见他们的“概论”，载于两人合编的《流行文化的再思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社，1991)，33—35页。但是这些观察很少激起后续研究，在研究新闻机构时参考布尔迪厄理论的尤其少见。

[2] 本文探讨的新闻媒介集中于以下的著作或论文：刊于1994年3月(101—102号)以“新闻的影响”为题的“社会科学研究”专集的文章：皮埃尔·布尔迪厄《新闻的影响》，R6miLenoir《话语的模糊性：公职危机与新闻场域》，PatrickChampagne和DominiqueMarehetti《受制约的医药信息：关于血液污染的丑闻》，以及LouisPinto《哲学新闻学》。AlainAccardo, G. Abou, C·Balbastre和D. Marine《日常生活中的记者：对新闻实践进行社会分析的尝试》(波尔多Masearet出版社：1995)；皮埃尔·布尔迪厄《政治场域，社会科学场域，新闻场域》(吕米埃尔大学人类学及社会学系课程，里昂2，1995年11月14日)和《关于电视》(巴黎：Liber-Raisonsragir出版社，1996)，近期的英译本(纽约：NewPress出版社，1998)；Patti&Champagne《社会疾病的媒介建构》，载《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12月)及《双重依附：对政治经济场域和媒介场域关系的一些评论》，载《赫尔墨斯》17—18(1995)；LouisPinto《行动中的理解：新观察家杂志》(巴黎：A-M. M6taili6出版社，1984)。我也引用了布尔迪厄与新闻媒介相关的理论或实证著作。此处我没有广泛探讨Champagne关于法国民意调查的兴起和它如何作用于新闻和政治场域的关系的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研究项目。参见Champagne《制造舆论：新的政治游戏》(巴黎：Minuit出版社，1990)，和收于布尔迪厄编辑的《人世苦难》中的《国家的视野》(巴黎：Seuil出版社，1993)以及Grania Rogers翻译的、收录于SheilaPerryandMakeCross编辑的《法国之声：社会、政治和文化认同》一书中的《选举前民意调查与民主》(伦敦和华盛顿：Pinter出版社，1997)。同时请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民意不存在》，载《当代》318期(1973年1月)：1292-1309页，及《民意调查：没有科学家的“科学”》，收录于皮埃尔·布尔迪厄《换句话说》(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168—174页。

[3] 例外包括政治上活跃的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和媒介研究者的伯明翰学派。

[4] 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生产场域》(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41页。

[5] 假设每一个场域有其自身无法化约的逻辑，场域理论倾向于避免使用类似“亚场域”这样的术语，因此，只有在“场域”中谈话场域。

[6] Champagne：《双重依附》，223页。

[7] 图1选自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的规则》(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124页。其他“俄罗斯玩偶”的视觉再现——象阶级关系场域、权力场域和文化生产场域之间的联系，参见布尔迪厄《文化生产场域》，37-39页，及DavidSwam《文化与权力：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社会学》(芝加哥：芝大出版社，1997)，136-140页。也请参见Loic J. D. Wacquant《艺术场域》(收录于MichaelKelly编辑《美学百科全书》，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8] 皮埃尔·布尔迪厄：《政治场域》，22页。

[9] Champagne：《双重依附》，216页。

[10] Loic J. D. Wacquant“前言”，收录于皮埃尔·布尔迪厄：《国家贵族》(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第6章。当然准确的场域等级秩序因社会之不同而异。

[11] Accardo：《日常生活中的记者》，21—23页。关于布尔迪厄更早的明确表述，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的逻辑》(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

[12] 布尔迪厄：《政治场域》，25页。

[13] 《日常生活中的记者》，48页，Accardo承认，‘‘工人阶级’’记者的两种习惯间存在的张力有助于形成对标准的新闻工作实践的批判视角，尽管如此潜在的破坏性因素通常被媒介

场域压倒性的中产特征所克服。来自上等文化或经济资本背景的新闻记者更可能具有动机和能力来改变基于他们‘异常的轨迹’之经验的场域。关于这一点，参见布尔迪厄：《国家贵族》，183-187页。

[14] Champagne: 《双重依附》，217页。

[15] Aecardo: {日常生活中的记者}，43-44页。在法国，电视记者中读过新闻学院的比例尤其高，在美国也是如此，实证研究可能可以精确地确定它会有怎样的效果。

[16] 法国电视一台是法国观众最多的电视频道，1987年起实行完全私有。Arte是法德政府合资的文化频道。

[17] Champagne: 《双重依附》，223页；及《社会疾病的媒介建构》。

[18] 布尔迪厄: 《政治场域》，26页。

[19] Champagne及Marchetti: 《受制约的医药信息》，60页。

[20] champagne: 《双重依附》，226页。媒介场域研究者认为，这个“知识分子”模式在战后早年支配了媒介场域，当然它无法防止一些报纸的煽情报道。

[21] Chamtmgre: 《双重依附》，227页。

[22] 布尔迪厄: 《政治场域》，24页；Champagne《受制约的医药信息》，及《双重依附》，228页。

[23] 场域间的聚敛可以被概念化为同质性的增强，或者围绕文化和经济资本的同样的相对比例，场域被建构的程度。再或者，以三维空间进行思考，在平行场域间的垂直空间可能消失，既显示相似的结构，也显示了实际的社会作用者在两个场域间更大的往返(运动)。

[24] 布尔迪厄: 《政治场域》，27页。

[25] 参见PaulBeaud和FrancescoPanese: 《从一个星系到另一个星系: 法国知识分子的轨迹》，载《媒介，文化和社会》第17期(1995)，410页，脚注3，法国大学生人数从1955年的15万名，上升到1985年的85万名。

[26] Pinto: 《哲学新闻学》，30页。

[27] Pinto: 《哲学新闻学》，27页。

[28] 对产生新的“知识分子文化平均化”环路的讨论，参见Pinto: 《行动中的理解》，47—56页。

[29] 布尔迪厄: 《关于电视》，70页。

[30] 参见GisdeSapiro: 《文学的理由: 德占期间的法国文学(1940-1944)》，载《社会科学研究》第111—112期(1996年3月)，3—35页。

[31] 关于这一点的更详细的介绍，参见Beaud和Panese: 《从一个星系到另一个星系》。

[32] 参见布尔迪厄: 《对一个广播段落的分析》，载《外交世界》1996年4月。节目的制作

人DanielSchneidermann在1996年第5期《外交世界》上撰写了同样长度的文章《电视能批评电视吗?: 回应布尔迪厄》。布尔迪厄在这个节目中的负面体验促使他将他的媒介批判进一步发展为两个小时的独白。经法兰西学院 /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NRS) 制作并于1996年5月在有线电视频道“巴黎首映”中播出。1996年出版的《关于电视》包括了这两个节目的播出稿和一个附录: 重新收录了载于1994年3月《社会科学研究》上的文章《新闻的影响》。该书不仅是一种知识分子批判, 而且是对媒介一政治领域的一种“干预”——通过“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来击败新闻业的逻辑。

[33] 布尔迪厄: 《关于电视》, 30页。

[34] 布尔迪厄: 《关于电视》, 64页。

[35] Lenoir: 《话语的模糊性》, 77页。

[36] Champagne和Marchetti: 《受制约的医药信息》。

[37] 参见, 例如Williamai~flson和Andre Modigliani: 《关于核电的媒介话语和舆论: 一种结构主义方法》, 载《美国社会学期刊》95卷 / 第1期(1989), 1-37页; ErichC~de和NachmanBen-Yeluda: 《道德恐慌: 文化, 政治和社会建构》, 载《社会学年鉴》第20卷(1994), 149—171; 及JosephR. Gusfidd《公共问题的文化》(芝加哥: 芝大出版社, 1981)。

[38] Champagne和Marchetti: 《受制约的医药信息》, 52页。

[39] 布尔迪厄: 《关于电视》, 77页。

[40] 布尔迪厄: 《关于电视》, 78页。

[41] 布尔迪厄编: 《人世苦难》。

[42] Serge Halimi: 《新的看家狗》(巴黎: Liber-Raisonsd' Agir出版社, 1997)。

ArianeChemind在1998年5月8日在《世界报》(第1、6页)上撰文《皮埃尔·布尔迪厄成为社会运动的精神源泉》, 罗列了布尔迪厄不断增长的政治行动主义和他自己的出版社在商业上的特殊成功。

[43] Michael Sehudson在《新闻生产社会学》(载《媒介、文化和社会》)第11期(1989), 262-289页)上区分了三个基本模式: 政治经济、组织和文化学。霸权(模式)可能更接近于政治经济(模式), 但结合了“文化”模式(我重新简单命名)的因素。Schudson也提到个人主义研究。个人主义研究的论点并不象前述的社会学流派那样是竞争性的模式。对记者的“自由主义”价值的美式批评利用了媒介的个人注意模式, 它意味着简单地以保守或“客观”记者来代替个人自由主义记者将改变媒介内容, 进而改变媒介整体的社会影。向。参见, 如S. R, Lichter, S. Rothman, 及L. S. Lichter: 《媒介精英: 美国的新权力经纪人》(Bethesda, Md: AdlerandAdler出版社, 1986)oHerbertGans在《选择新闻》(纽约: Vintage出版社, 1979)79页中提及了新闻生产的技术理论。表1仅提供了每种模式的支配性特征。一些例外标注在文中和尾注中o

[44] 布尔迪厄: 《关于电视》, 44页。关于政治经济的强烈的论点, 参见, 如, BenH. Bagdikian《媒介垄断》(波士顿: Beacon出版社, 1983), 及赫伯特·谢勒《跨国媒介: 制造全球消费者》, 载《国际事务期刊》第47期(1993)。在法国, 场域理论刻意将其与Ahhnsser的观点区分开来。后者认为, 媒介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工具”, 其功能与再生产资本控制并无矛盾。

[45] 布尔迪厄：《关于电视》，58页。Regis Debray关于法国知识分子的著名的历史著作《法国的精神力量》，事实上得益于布尔迪厄对不断媒介化的知识分子场域的分析。参见，RegisDebray《法国的精神力量》（巴黎：EditionsRamsay出版社，1979），英译本《教师、作家、名人：现代法国的知识分子》（伦敦：Verso出版社，1981）。GillesDeleuze对媒介知识分子的分析也被Debray和布尔迪厄加以引用：他认为新闻业创造了“新的思想类型：访谈—思想，对话—思想，即时思想”，这和布尔迪厄提及的“快速思考”和“丢弃(throw-amy)思想”如出一辙。参见Debray引用的GilesDeleuze“未发表的和私人传阅的文章”，1981年，92—93页。不过，Debray最近的《媒介学》，一本折衷混合麦克卢汉的技术主义、罗兰·巴特和UmbertoEco记号学，以及观念的历史的理论著作，不再和布尔迪厄的研究有如此亲密的关系。参见，Debray《普通媒介学教程》（巴黎：Galli—mard出版社，1991），及《媒介宣言：关于文化形式的技术传递》（伦敦：Verso出版社，1996）。关于经典的“强烈的”技术观点：认为新技术推动人类感知的新形式，是社会变化的引擎，请参见麦克卢汉《理解媒介》（纽约：企鹅出版社，1964）。但是场域理论并没有完全贬低技术因素。参见，Champagne《双重依附》和Champagne、Marchetti《受制约的医药信息》。关于另外的结合技术因素而非仅仅依赖技术因素的媒介分析的多因果模式，参见ManuelCastells的三卷本《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牛津：Blackwell出版社，1996—1998）。

[46] 布尔迪厄：《关于电视》，68页。

[47] DominiqueWolton：《大众的赞歌：一个有关电视的批判理论》（巴黎：Hammadon出版社，1990），9页。也请参见Dominique Wohon和Jean-Louis Missika：《想象力：民主社会中的电视》（巴黎：Galli—mard出版社，1983）。Wohon《大众的赞歌》，10页，引证了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约瑟夫·克拉珀、埃利休·卡茨等研究者的“实证视角”——他们因不重视媒介力量而强调受众自由解读媒介讯息的能力而著称。

[48] 布尔迪厄：《新闻的影响》，重新收录于《关于电视》，88页。Wolton也和由AlainTouraine创立的社会运动的“干预”社会学中心的主任MichelWieviorka合作出书。尽管Wieviorka和Touraine没有关于媒介的大量著作，但他们的与其说社会学家是社会科学家，不如说是“公众知识分子”的观点，以及他们频繁地在报纸和电视上亮相，与布尔迪厄坚持的社会学应对大众传媒保持独立的(观点)大相径庭。参见，Michel wieviorka：《知识分子，不是自由职业者：社会学在法国》，载《当代社会学》26(1997)，288—292页。

[49] 许多早期的经典研究，诸如GayeTuchman、HarveyMolotch和Marilynkester的研究都通过PeterBerg·er和ThomasLa&mann，受到AlfredSchutz的现象学的深刻影响。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与其说新闻是反映“外部”的现实，不如说新闻是“被建构的”。EdwardJayEpstein的电视新闻研究有一个相对更适度的目标，即显示：新闻与其说是反映记者个人的观点或特性，不如说是由机构生产的。参见，如Gaye Tuchman.《制造新闻》（纽约：自由出版社，1978）；Leon V. Sigal：《记者与官员：机构和新闻制作的政治学》（莱克星顿，马萨诸塞州：D. C. Heath出版社，1973）；HarveyMolotch和Marilyn Lester：《新闻——有目的的行为：日常事件、丑闻和谣言的策略使用》，载《美国社会学评论》39(1974)，101-112页；EdwardJayEpstein：《无所不在的新闻：电视和新闻》（纽约：兰登书屋，1973）；及MarkFishman：《生产新闻》（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80年）。最近，MarkPedelty的《战争故事：驻外记者的文化》（纽约及伦敦：Routledge，1995）将一种人种学的组织取向与接近福柯和Althusser的理论框架联结起来。

[50] 参见，如，S·霍尔、ChasCricher，TonyJefferson，Johnclarke和BrianRoberts：《控制危机》（纽约：Holmes & Meier出版社，1978）；T·吉特林：《全世界在注视》（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0），及《媒介社会学：支配范式》，载《理论与社会》6(1978)，205-253页；以及DanielHallin《未经审查的战争：媒介和越南》（纽约：牛津大学出

版社, 1986)。Gans的分析也至少与霸权理论有内在的密切关系。在最后的分析中, 他强调传递统治阶级的官方来源的重要性。参见Gans, 《确定新闻》, 281—285页。布尔迪厄和他的同事与RaymondWilliams及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 如S·霍尔、DickHebdige, 和Pattiwilis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对话(参见布尔迪厄和L Macquant, 《反射社会学引论》(芝加哥: 芝大出版社, 1992), 80—81页。Champagne和Marchetti: 《受控制的医药信息》, 46页, 当他们说新闻媒介定义社会问题的力量源自“(媒介的视野中)接近于公众知觉中的预存的事实”时, 似乎是要做一个“霸权类型”的辩论。

[51] RogerFrieclland, RobertR. Alford: 《社会归整: 符号、实践和制度矛盾》, 收于W. W. PowellP. J. DiMaggio编《组织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芝加哥: 芝大出版社, 1991), 和NeilFligstein及DougMcAdam《战略行动问题的政治——文化取向》(修改稿, 最初提交1990年8月的美国社会学协会年会)。也请参见Dinmggio和Powell在《新制度主义》中的“导言”。

[52] Friedland和Alford: 《社会归整: 符号、实践和制度矛盾》, 224页, 引用了DiMaggio“制度理论中的利益和作用力”(收于L. C. Zucker编《制度模式和组织》, 坎布里奇, 马萨诸塞: Ballinger出版社, 1988, 3—22)。DiMaggio和Powell“导言”, 38页, 脚注29, 评论了新制度主义与Gramsci的密切关系, 及针对权力议题的霸权理论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被新制度主义者所忽略。他们(同前, 脚注28)也注意到“布尔迪厄的观点和新制度理论间天然的亲密关系。”他们感叹“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和“尚未发生的”新制度主义之间存在很大的“对话”空间(如前, 脚注29), 尽管人们可能认为布尔迪厄的理论精确地提供了这种对话。然而, 近期的媒介新制度主义分析并未提及布尔迪厄, 参见T. Cook《新闻统治》(芝加哥: 芝大出版社, 1998)。

[53] 关于短路错误的讨论, 参见布尔迪厄: 《文化生产的场域》, 181页、188页。在这点上, 布尔迪厄学派特意将自己与Gy6rgy Luktics, Lucien Goldmann和Theodor Adomo的著作相对照。WendyGris—wold的文化分析模式包含了文化生产者直接的“社会种类和团体”, 和场域理论所强调的文化生产者的特定职业利益潜在地相结合。但她既没有侧重这些特定的利益, 也没有侧重它们与最接近的机构的或社会团体的影响是如何相区别或相联系。参见Wendy Griswold《一个文化社会学的方法论框架》, 载《社会学年鉴》(1987), 20—26页, 及《意义的构造: 文学解读在美国、英国和西印度群岛》, 载《美国社会学期刊》92 / 5(1987年3月), 1077—1117页。

[54] 许多媒介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媒介体制比较研究的严重缺乏。参见, 例如, Mi&adSchudson: 《新闻生产的社会学》及StephenHilgarmer和CharlesL. Bosk: 《社会问题的起落: 一个公共竞技场模式》, 载《美国社会学期刊》94 / 1(1988), 53—78页。关于对跨国媒介研究和“结构性思考”需要的问题的讨论, 参见J. C. Blumler, J. M. McLeod和K. I Rosengren编《比较演说: 跨越时空的传播和文化》(加州, Nowbury公园: Sage出版社, 1992), 尤其是第1和12章。当Lo~cJ. D. Wacquant, 在“前言”(收于皮埃尔·布尔迪厄《国家贵族》, 第13章)中指出应当转而研究其他国家的语境, 并不是布尔迪厄关于法国权力场域的特定的实证发现, 而是“被场域理念压缩了的相关思考模式”。跨国研究也能帮助微调场域理论的概念化工具。例如历史上, 美国和法国对自主性的新闻业的观念就不相同——美国新闻业对揭露官员腐败理想化, 而法国重视知识分子表达的微妙之处。对“自主”的具有民族优越感的定义, 可能是为什么布尔迪厄和他的同事没有对法国官僚机构对深度报道设置的重重法律障碍的方式给予更多关注的原因之一, 就像美国的研究者不会对美国新闻媒介的“反知识分子主义”过分关心一样。跨国研究的增多或许能够帮助国内的研究者克服这样一个事实加诸他们的“盲点”, 即他们不得不接受许多他们试图去研究的社会(认为)理所当然的(状况)。

[55] 皮埃尔·布尔迪厄: 《学人》(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98), 38页。也请参见布尔迪厄: 《政治场域》, 23, 26—27页。这个省略可能部分地反映了法国相对统一的权力结构

的存在。

[56] 关于布尔迪厄对国家的理解中教育的首要性，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国家贵族》（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对国家的再思考：官僚场域的起源与结构》，载《社会学理论》12 / 1(1994年3月)，1—18页；及与Loïc J. D. Wacquant合著的《反射社会学引论》，113—115页。

[57] Champagne：《国家的视野》，及布尔迪厄：《对国家的再思考》，4—5页。

[58] 例如，布尔迪厄在《对国家的再思考》中，15—16页，强调“特定化的(国家)作用者和他们特定的利益”及“官僚微观世界的特定功能”。

[59] Champagne：《双重依附》，219页。

[60] 参见Daniel C. Hallin：《我们永保美国世界第一：电视新闻业和公共领域》（纽约：Routledge出版社，1994）中关于在美国新闻媒介和政党、国家及经济之间的变化中的并经常矛盾的权力关系的深刻分析。

[61] 但请参见John H. McManus：《市场驱动的新闻业》（加州，Thousand Oaks：Sage出版社，1994）关于对强大的经济压力对美国电视新闻和平面新闻媒体的效果的仔细检视。他的分析在某些方法上与场域理论平行，如探讨“新闻和市场逻辑”间的张力。

[62] 布尔迪厄：《关于电视》，47页。

[63] 《在线》杂志所代表的互联网和新计算机技术的鼓吹者是受众“自由”的激烈拥护者，但是这些“新媒体”尚处于场域理论家当下研究的范围之外。关于对被动——主动受众的争论的评论和分析，参见Joshua Coombes：《对名望的主张：当代美国的名人》（伯克利：加大出版社，1994），186—215页。事实上，他试图分析文化生产和接受两个方面，但是最终却采取了主动受众的模式，忽略了阶级分层的议题，并且，在对媒介名人的意义多样“解读”的基础上，得出了过于乐观的结论：受众是民主复兴的潜在源泉。

[64] 关于文化—组织取向的一个明显例外：它也考察受众，参见Gans《确定新闻》，特别是214—248页。

[65] 布尔迪厄：《差异》（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84），239—240页。也请参见Louis Pinto：《行动中的理解》，27页。他认为，在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早期，《新观察家》杂志和它的竞争对手相比，还与由成长中的大学学生和研究生组成的“实际和潜在的受众”建立了联系。

[66] Pinto：《行动中的理解》，特别是21—79页；布尔迪厄：《差异》，440—453页。也请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生产信仰：对符号物品经济的贡献》，载《媒介、文化和社会》2（1980），特别是272—273页。

[67] 布尔迪厄：《差异》，231页。

[68] 布尔迪厄：《生产信仰》，268页。

[69] 媒介场域研究者尚未详细考察电视新闻生产和特定受众间的关系，事实上(它们之间)可能有重要的因果关系。例如，Gans发现在70年代的美国，收看电视新闻和阅读全国新闻杂志的受众之间存在显著不同。

[70] Champagne: 《大数法则: 受众的测量及公众的政治代表》, 载《社会科学研究》, 101—102页(1994年3月), 10—22页。也请参见布尔迪厄: 《关于电视》。

[71] Wendy Griswold: 《一个文化社会学的方法论框架》, 2页。也请参见Griswold: 《意义的构造: 文学解读在美国、英国和西印度群岛》, 1080—1081页。

[72] 参见, 特别是DiMaggio: 《艺术分类》, 载《美国社会学评论》52(1987), 440—455页。他与布尔迪厄共同参与这个课题, 但仍未完成严肃地以文化供给和消费间复杂的关联对新闻媒介的研究。

[73] Daniel C. Hellin在一个对自越战以来美国电视的外交政策冲突的框架(framing)的分析中, 明确抛弃了霸权的功能主义样式。然而, 他的研究得出结论: “工作中能够清晰地看到霸权(分析的)步骤, 将传播保持在对现存秩序相对较小威胁的限度内”。参见他的《我们永保美国世界第一》, 80—81页。

[74] 如Schudson在《新闻生产社会学》279页中提到的, 主要的英—美研究取向“经常倾向于忽略新闻工作的特性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和“在当代新闻的社会学研究中极少参考或考虑能揭示长时期的新闻采集和写作模式显著不同的媒介的历史研究”。关于一个受哈贝马斯影响的媒介变迁和社会变迁的模式, 参见D. C. Hallin: 《我们永保美国世界第一》, 特别是1—39页。关于一个新帕森斯视角, 参见Jeffrey C. Alexander: 《在体制、历史和比较视角中的大众新闻媒介》, 收于埃利休·卡茨、Tamk Szecsk~编《大众传媒和社会变迁》(伦敦: Sage出版社, 1981), 17—51页。通常, 布尔迪厄以他的场域理论反对功能主义、组织主义和许多版本的制度理论中“内在的自我发展的”印记。参见布尔迪厄和Wacquant: 《反射社会学引论》, 102—104页。

[75] 关于这个批评, 参见, 如RaymondWilliam《电视: 技术和文化形式》(纽约: Schocken出版社, 1975)。

[76] 布尔迪厄: 《政治场域》, 21页。

[77] 布尔迪厄: 《艺术规则》, 154页。

[78] 布尔迪厄: 《国家贵族》, 183—186页。

[79] 参见, 如, Champagne、Marchetti: 《受制约的医药信息》, 50—52页; 布尔迪厄: 《政治场域》, 6页。

[80] 布尔迪厄: 《文化生产场域》, 57—58页; Champagne: 《双重依附》, 217页; Champagne、Marchetti: 《受制约的医药信息》, 40页。

[81] 布尔迪厄和Wacquant《反射社会学引论》, 110页。Beand和Panese在《从一个星系到另一个星系》, 410页, 脚注8, 认为得自布尔迪厄灵感的研究强调外部市场影响。但是它忽略了无法严格化约为市场影响的形态学上的和其他的变化——而那是经常需要加以参考的。例如, 布尔迪厄在《差异》594页脚注52中解释, 70年代, 由于年轻读者少, 以及左翼的《世界报》和《新观察家》的兴起, 政治上和文化上保守的《费加罗报》和《曙光报》衰落了, 这是“非常直接地反映了迎合教育资本中小部分最富有的人的统治阶级形态学上的变化”。

[82] Pinto《哲学新闻学》, 26页。在这点上, 场域理论家和新制度主义者的立场也相同。Fligstein和McAdam《策略行动问题的政治—文化取向》列举了“它的因果关系机制的异质性”作为新制度研究取向的定义特征之一。

[83] 一般而言，媒介场域模式较少聚焦于解释(场域的)外部因素，而更多地侧重于解释这些因素是怎样被新闻媒介场域的内在逻辑“转化”(以及，由此，这个被转化的逻辑如何被转化到其他相关场域)。因此场域理论，尽管它强调的是电视的商业化，但它并没有发问：商业压力的增加为什么以及怎样一开始就被纳入法国新闻媒介的场域?为什么电视和广播的私有化发生在一个社会党总统(译按：指密特朗)任内?以及为什么私有化发生在一些部门而不是其他部门，了。

[84] Champagne: 《制造舆论》，38页。

[85] 关于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参见，如l Spillman: 《文化，社会结构和推论的场域》，载《社会理论的当前视角》1 / 15(1995)，129—154页；及I. Silber: 《空间、场域、边界》，载《社会研究》62 / 2(1995夏)。

译者说明：

本文发表于1998年《理论与社会》第28期，463-498页。荷兰kluwer学术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加大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现为巴黎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Paris, AUP)国际传播系主任。本文的翻译与刊登均征得了作者允许。考虑到篇幅，翻译中略去了文章最后的“鸣谢”部分。文中法语部分的翻译经过了加大河滨分校比较文学系博士生李洁的校对。文中可能出现的错误，自当由译者负全责。

文章管理：肖克（共计 794 篇）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 比较语境中的场域理论：媒介研究的新范式 会员评论[共 0 篇] 卜

← 我要评论 卜

会员名

密码：

提交

重写

关于CDDC ◆ 联系CDDC ◆ 投稿邮箱 ◆ 会员注册 ◆ 版权声明 ◆ 隐私条款 ◆ 网站律师 ◆ CDDC服务 ◆ 技术支持

对CDDC有任何建议、意见或投诉，请点[这里](#)在线提交！

◆ MSC Status Organization ◆ 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 版权所有 ◆ 不得转载 ◆ Copyright © 2001--2009 www.cddc.net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有违反，追究法律责任.